

李約瑟《中國的科學與文明》 六卷六冊(中國醫學史)引言¹

何丙郁²

(中央研究院院士)

作為執行編輯，席文(Sivin)從李約瑟(Needham)個人醫學史研究手稿中選出了長度適中的五篇「短論」輯成此卷。這批「短論」分別題為：(a) 中國文化中之醫學；(b) 衛生與預防醫學；(c) 資格考試；(d) 免疫學之源起；以及(e) 法醫學。編者除了就這批短論提出了內容堅實的〈導論〉與〈附錄〉，也加入個人解說以闡明李約瑟的原文。

熟悉《中國之科學與文明》叢書其他卷帙者，一經比較，想必會對本卷篇幅的單薄感到訝異。由於李約瑟和魯桂珍在生物化學以及營養科學上的精湛造詣，與當代醫學的關係遠較物理科學為之密切，李約瑟中國醫學卷的問世，長期以來不僅引人殷盼，許多人甚至也期待，該書的篇幅當會超越他研究中國科學史的其他作品。為此，叢書的總編輯 Christopher Cullen 以及本卷的編輯席文提出了說明，但進一步的說明則尚待來日。

編者與李約瑟中國醫學史研究取徑上的差異在本卷中展露無遺。李約瑟曾兩度引席文為例，分別在1974年出版的《中國之科學與文明》第二卷，頁 vxiii 的註腳，以及1976年出版的第三卷，頁 xx 的註腳中指出：在他和他的「同道」之間，從無觀點的完整一致性可言。有趣的是，我們在〈導論〉中看到了李約瑟與這位他在《中國之科學與文明》第二卷，頁 vxiii 中引為「第三同道」者，在中國科學與醫學史研究取徑上的分歧。

編者的〈導論〉指出：「魯桂珍與李約瑟旨在撰作一部包羅醫學多方面向的研究鉅著，以作為《中國之科學與文明》一部分。他們曾據此整體觀點，寫作了多篇重要的相關短論，且多數發表於1939至1970年間。目前，人數不斷成長的一班出色學者——他們多數還處於學術志業的起步階段，已重新彙集若干問題，另闢甚具前景的研究蹊徑。而在這班後起之秀中，許多人曾受到魯桂珍和李約瑟作品的啓迪。然而，值此《中國之科學與文明》叢書幾近完竣之際，我們必須面對的事實是：在可見的未來，已無人能從容地以符合此一叢書的高標準方式，就醫學史的整體進行考察……」

儘管魯桂珍不斷耳提面命，李約瑟著手寫作醫學史卷的工作仍然時不我與。他在1986年出版《槍砲與史詩》與《植物學》兩卷之後，才開始聚精會神撰寫醫學史卷的工作。但與此同時，創建以其姓氏命名之研究中心，以及元配夫人 Dorothy 的病痛，也都分散了他的心力。令人感歎的是，逝者如斯，不舍晝夜，老耄與宿疾逐漸使李約瑟發現在嘗試傾讀醫學史相關近著時，面對了嚴重的困難。諷刺的是，之所以如此，竟部分肇因於他在醫學史課題上所啓益的眾多後生晚輩。但這批後生在作品中所採取的新取徑，並未絲毫減輕李約瑟準備工作的負擔。1990年，當我赴李約瑟研究中心就任時，魯

¹ Needham, J. (2000)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I. 6 (Cambridge) edited by Sivin, N., xviii, 261 pp. 10 illus., 3 tables, Bibliographies, Index

² The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 Cambridge

桂珍除了偶爾與李約瑟在研究室共進午餐外，已罕至研究中心工作。無人對她高齡八十五而缺席加以責難。次年，她隨即病逝。但年長她四歲的李約瑟，卻仍老驥伏櫪孜孜不倦。以他之高年，大可頤養天年，但對魯桂珍的愛，以及不願負其所託的祈望卻鞭策著他辛勤如一。本書手稿的完成，以及出席 1995 年「紀念魯桂珍研討會」，實現了他最終的願望。

1990 年，李約瑟曾告訴我，有關他正嘗試就文澍德 (Unschuld)、席文與波克特 (Porkert) 等人的作品進行評析，以及他如何發現自己與他們之間的密切交涉的細節。但看來相當諷刺的是，到頭來，李約瑟自己卻成了席文評析的對象。根據席文的看法，今天李約瑟的研究取徑也許並不當令，但也正是此一取徑，使他在當代醫學的專業領域中取得一席之地，而在 1980 年代早期，由聲譽卓著的皇家醫師學院遴選為榮譽院士。在席文致力以文化取徑使此卷順當行世之後，本書當可引發所有讀者的興趣。凡有心傾讀更多李約瑟中國醫學研究作品的讀者，歡迎參看李約瑟和魯桂珍合著，於 1980 年劍橋大學出版的《針灸：歷史與理論》(*Celestial Lancets*) 一書。但望中國醫學史的文化研究終能繁花似錦，亦祈願吾等能繼續嘗試瞭解李約瑟所亟欲彰顯的不同文化間醫療科學的一體性。